

经典化与《正气歌》的多维传播

范春义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文天祥《正气歌》是爱国主义诗歌的名篇佳作,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经典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多维传播特征:多维是指通过文本、碑刻拓片、书法作品、工艺作品、戏曲音乐、民间念诵等多种途径,从阅读与倾听全方位的传播;同时,其传播还涵盖各个社会阶层,跨越雅、俗两种文化层次。中国社会对《正气歌》的接受度非常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其反映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恒久魅力,宜被不同时代民众接受并践履;二是人、文相助,名人作者与文学名篇的良性互动,既强化了二者紧密关系,也提升了二者声誉;三是其内容上跨越雅、俗,兼具主流意识与民间实用功能,传统趋利避害观念宜使其价值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阐释和开发。

关键词:文天祥;《正气歌》;多维传播;经典化;大众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07.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9)01-0021-10

《正气歌》是文天祥在北京狱中完成的作品,作为爱国主义诗歌的名篇佳作,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被广为传颂。对其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的阐释上,着重阐发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写作技巧,各种鉴赏辞典和选本注释均用力于此,亦有学者将其与日本人藤田彪《正气歌》进行比较阐释。二是以钱锺书《宋诗选注》不录此诗为话题展开讨论,重点分析钱锺书的选诗标准,涉及对建国以后诗歌研究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对《正气歌》艺术性本身的分析,包括其原创性问题、用典的准确性问题等等。在现代学术领域,《正气歌》不被钱锺书《宋诗选注》收录,在各种文学史类著作中,其论析的详细程度也远不及文天祥的《金陵驿》;但在社会生活中,此诗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金陵驿》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学界尚缺乏深入讨论。而如果从传播和接受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其经典化的过程,这一问题就会得到合理解释,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此诗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

一

作为诗歌,《正气歌》的传播具有多维性特征。首先是通过文本、碑刻拓片、书法作品、工艺作品、戏曲音乐、民间念诵等多种途径,从阅读与倾听全方位的传播。对文人阶层和社会精英阶层而言,《正气歌》既通过文天祥文集的刊刻而得以流通阅读,也通过各种选本的刊刻得以传播。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金陵驿》。

收稿日期: 2018-08-20

作者简介: 范春义,男,山东安丘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正气歌》作为诗歌,最早收录于《指南录》。文天祥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强的保存意识,多次进行加工整理。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自编《指南录》,并有《自序》及《后序》。至元十七年(1280),文天祥在狱中自编《指南后录》四卷,并有分卷序或跋。发广州至金陵为一卷;发建康至当年年终为一卷;庚辰年(1280)元日以后拟作一卷;尚有《零丁洋》诸诗及原先的《后录》手本在惠州弟弟处,未收录,拟合为一卷。本年文天祥还自编《集杜诗》二百首,并有《自序》。至元十八年(1281),文天祥在狱中,将《指南后录》又重加编次,合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为一卷,交给其弟文壁带归。开始了家族之间的传播和接受。书肆刊刻几乎同时进行。与此同时,其所作诗篇,广传狱外,争诵一时,被书肆收刊为《吟啸集》。壬午年(1282)所作诗,在作者死后,由朋友张弘毅带归庐陵,后来收入《后录》之中。元贞二年(1296),文天祥弟文壁、友人邓中甫、张弘毅、聂吉甫等人搜访编辑,为前集十二卷,后集七卷,付梓刻印,也称为道体堂刻本。明初,尹凤歧得道体堂刻本,重加编次,为诗文十七卷,均为德祐元年起兵以前所作。景泰二年(1451),陈价将尹凤歧所编次的诗文集刻印,名为《文山先生文集》,并附《指南录》一卷、《后录》二卷,韩雍为序。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此种版本。嘉靖中(1540年左右),鄢懋卿得《文山先生文集》,再加编次,名为《文山先生全集》,由宁宠刻印,这是最早的文山全集。嘉靖三十九年(1560),庐陵郡守张元瑜取鄢本翻刻,名为《重刻文山先生文集》,罗洪先为序。万历三年(1575),庐陵胡应皋又加翻刻,名曰《文山先生全集》,潘侃为序,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明末,文天祥的后代南庄公(文继宗?)复刻之于道体堂。清康熙十二年(1673)重刻《文山先生集》,王雅为序。雍正三年(1725),文天祥十四世孙有焕与十六世孙文凤翔、文凤翀据其家藏南庄公刻本,参证其他版本,重加编次,以《御试策》冠于卷首,补入《狱中家书》与《临刑诗歌》,付梓刻版,名为《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简称《庐陵文丞相全集》。道光十七年(1837),文成章重刊《文信国公全集》,裕泰为序。道光二十三年(1843),文桂堂重刊《文信国公全集》,并为序。光绪十三年(1887),仕江周谷谄堂重镌《庐陵文丞相文山先生全集》。此外,尚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学基本丛书《文山先生全集》,据四部丛刊影印本,以铅字排印;郑振铎先生编、生活书店发行的《指南录》与《指南后录》;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发行的《文天祥全集》,据《文山先生全集》铅字本影印。^①随着文天祥文集的多次编纂和刊刻,《正气歌》得以广泛流通和传播。除此之外,《正气歌》的进入部分选本和建国后大学通用教材,使其传播深度和广度在当代得到进一步扩大。

作为传播载体的印刷文本,供人阅读是最主要的接受途径。如文天祥同时代人林景熙有《读〈文山集〉》云:“苦寒尚卧苏武节,垂尽独存杲卿舌。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②“苏武节”“杲卿舌”均为《正气歌》之用典,可见《文天祥集》传播之快速。除了在国内流传、影响国人,《正气歌》还远播海外、影响喜爱中华文化的外国人。如日本人藤田彪就深受《正气歌》影响。藤田彪(1806—1855),字斌卿,号东湖,通称虎之介,常陆水户(今茨城县)人,江户末期儒学家。其父藤田幽谷是尊王攘夷论者,东湖自幼受其熏陶,深受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文政二年(1819),东湖赴江户从龟田鹏斋等习文武;天宝三年(1832),拥立德川齐昭为水户藩主,协助藩政改革,为尊重皇室和加强海防而

① 邓晓琼:《论文天祥的诗歌艺术》,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7年,第4—5页。

② 林景熙:《读文山集》,《留取丹心照汗青——历代诗人咏文天祥》,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第4页。

尽力,后因与保守派矛盾激化,一度被囚。嘉永二年(1849)复归藩政,东湖主张尊王攘夷,为尊王倒幕运动之先驱,声誉遍于全国,其思想对桥本王内、西乡隆盛等维新人士影响很大。安政二年(1855),江户大地震,东湖遇灾而死。其撰《和文天祥〈正气歌〉并序》云:

彪年八九岁,受文天祥《正气歌》于先君子。先君子每诵之,引杯击节,慷慨奋发。谈说正气之所以塞天地,必推本之于忠孝大节然后止。距今三十余年。凡古人诗文,少时所诵,十忘七八。至于天祥《歌》,则历历谳记,不遗一字。^①

由藤田彪在困难时的以《正气歌》自励可知,此诗蕴含着重要的精神价值,在文人阶层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文本阅读。

一

对于文人而言,阅读是接受《正气歌》的最重要途径。此外,碑刻、书法、戏剧、影视等也都是感染和接受《正气歌》的途径。其中,《正气歌》碑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正气歌》刻于文天祥祠的某一墙壁,这是构成祠堂语境的重要文化要素。另一种是将《正气歌》刻于某地碑石,今多已移置于各地碑林博物馆内,如兰州石刻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安碑林都收藏有《正气歌》石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名人立祠以示纪念是一优良传统。最早的文天祥祠是于其死后、由其弟文璧负责完成的。此后,各地纷纷建立文天祥祠,具体情况见高茂兵之统计^②:

文天祥祠的地理分布情况简表

江西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广东		北京		广西		山西		合计	
专祀	合祀																		
4	11	7	5	2	0	1	0	1	0	3	3	1	0	1	0	1	0	20	20
15		12		2		1		1		6		1		1		1		40	

祠堂作为祭拜瞻仰场所,必须辅以必要的文化背景介绍;在文天祥祠中,《正气歌》就是构成祠堂文化语境的核心要素。历史上的文天祥祠,大都摩刻《正气歌》以供游览拜谒者观阅;今天的文天祥祠,同样如此。此仅以北京和浙江江心洲文天祥祠为例,略加述说。

北京文天祥祠位于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处为三进房屋,进得大门,有文丞相塑像一尊,刻石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

① 李寅生、宇野直人编:《中日历代名诗选 东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13页。

② 高茂兵:《文天祥祠考论》,《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该文能够大致反映文天祥祠的分布情况,具体数据有遗漏,如江西文天祥纪念馆就不在统计之列。

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自赞”。东侧墙壁有摹刻明代书画家文征明书文天祥《正气歌》。文征明(1470—1559),江苏长洲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因与文天祥同姓^①而刻其《正气歌》于石。这套石刻原为铺在京郊达园宾馆的台阶石,50多年前,一位共和国元老曾在达园宾馆小憩,偶然发现了这些石刻台阶,于是责成有关部门把这些石刻保护了起来,先是存放在海淀文管所,后移至北京石刻博物馆。^②

浙江江心洲文天祥纪念馆建有“浩然亭”,其意取自《正气歌》“其气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而与唐代诗人孟浩然无关。明成化十八年(1482),由永嘉知县刘逊向温州知府项澄提议,始在江心寺东侧建祠纪念。祠宇为三间二进小合院式,面积821平方米;正中塑有文天祥彩绘坐像,高3米,身穿长衫,腰佩宝剑;东西两墙内壁绘有“督师护国”“阴房正气”“抗节成仁”等六幅重彩壁画,回廊陈列有上刻《北归宿中川寺》《正气歌》等文天祥诗和18块后人凭吊诗词的刻石。^③

此外,在文天祥埋骨之地——吉安,当地学校为了宣扬文天祥思想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操场墙壁上也刻有《正气歌》全文。作为公共空间,名人祠堂、学校操场等在供人休憩、娱乐的同时,也供人拜谒游览;在这个过程中,《正气歌》得到阅读、欣赏和接受。

那些《正气歌》刻石,除了立于祠堂或操场等公共场所以供人们阅读、欣赏外,其中一些书法精美、雕工优秀的,还成为拓片的资源和基础。《正气歌》石刻拓片也是广为传播。按照石刻可否移动,可以分为摩崖石刻和普通碑刻,摩崖石刻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两种形式的刻石中,《正气歌》均有保存。今紫金县中坝镇广福村岐山寨高山上有一座庙宇,名碧云古洞,碧云洞左侧厅中堂立轴有藏诗象形画“竹叶诗”:“大节干霄日,虚心效圣贤。文山聊写意,挺拔万年坚。”经考证,系1911年重阳佳节前几天,邑人范守明等三五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新吾氏”(序后署名)登高,会于永安县〔民国三年(1914)1月1日更名紫金〕簾紫嶂碧云洞(即今广福村岐山寨),言及文天祥之前事,欲刻《正气歌》置洞内。大家做“扶鸾”之法事,与文天祥的神灵沟通,得到文天祥“飞鸾训文”之“竹叶诗”,于是敬录刻石,刊于《正气歌》前面,两侧楹联配以“大节芳名垂万古,忠心正气炳千秋”,构成一幅内容丰富、形式特别之中堂,也是希望此地能够以名人而扬名。^④

普通碑刻《正气歌》,流布范围较广,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就收录有数种。《兰州碑林藏甘肃古代碑刻拓片菁华》第一六〇通为《正气歌碑》,西安碑林就有民国书法大师于右任的刻石。有的《正气歌》原碑已经不存,幸有拓片存留下来,并被收藏家所追捧收藏。许多名人都曾书写《正气歌》并刻碑,简要介绍4例:

1. 张裕钊书《正气歌》,规格:128×68cm。张裕钊(1823—1894),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其

① 《文征明书画简表》一书中,著录有一种文征明行书《正气歌》,原文为“行书《正气歌》——《岱宗小稿》《桐菴文稿》《苏州府志》有著录;末款落‘裔孙征明书’;在文丞相祠。”详见:周道振编:《文征明书画简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② 参见北京石刻博物馆藏:文征明行书《正气歌》刻石书法册前言,2012年1月4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312c8601010cyy.html。

③ 本书编写组编著:《诗画山水 浙江(一)》,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④ 司雁人:《令人千古吊忠魂——读紫金县南岭镇大忠庙楹联兼谈河源文化精神之传承》,《河源日报》2018年1月7日,第2版。

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伦比”的清代书法家。

2. 清大学士左宗棠书《正气歌》,民国拓本。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对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书法作品世间多有流传,《正气歌》就是一例。

3. 黄自元书《正气歌》刻石。黄自元(1837—1918),字敬舆,号澹叟,湖南安化县龙塘乡人,清末书法家,实业家;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清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次年殿试列第二(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江南乡试副考官,民国七年(1918)病逝。黄自元曾临摹《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书帖,其所书《正气歌》刻石为《正气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于右任书《正气歌》刻石。于右任先生是近现代学术成就最高的书法宗师,他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书圣”。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1944年,远东图书公司印行了于右任先生草书《正气歌》真迹。

此外还有用印石刻制的《正气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王孙正气歌刻石》。1938年9月18日,“中国印圣”王王孙完成了60方文天祥《正气歌》印石。印石一出,引起全国轰动,大大鼓舞了抗战民众的信心。后来,为了支持抗战、拯救灾民,60方印石被高价出手。流离辗转后,印石最终流落到大英博物馆,成为英国国宝之一。当时,王王孙曾自费出版《王王孙正气歌刻石》,篆刻由于右任题签,由《泱泱丛刊·当代名人印迹》发行,民间仍有流传。^①

三

书法是中国独有文字书写艺术,其根基于独特的书写工具造成笔画变化多端,表意汉字所形成的广阔空间。书写对象的选择显示了书写者的思想倾向和主观选择。因为《正气歌》的爱国追求和文人气节因素,契合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因此被后代书法家广泛书写。除了自我欣赏之外,经常作为书法参赛的书写对象,关于《正气歌》的书法作品,数量惊人,仍在不断产生。笔者从网易360图片搜索《正气歌》,自动显示相关搜索有“正气歌书法 文天祥正气歌图片 杨再春行书正气歌 文天祥正气歌书法 文天祥正气歌 正气歌硬笔书法 正气歌书法作品欣赏 正气歌书法楷书”等,共得图片23796篇。除个别非书法作品外,这些图片显示:多数《正气歌》书写于卷轴之上,也有书写于墙壁、竹简等实物之上者;既可以珍藏阅览,也可以悬挂装饰。试举两例:

1. 清光绪乙巳年(1905)山东殷廷玉行书立轴文天祥《正气歌》,绢本题名,水墨(黑白)材质。装裱形式:立轴;尺寸:187×47cm;款识钤印:“瑞琴”“殷廷玉”。殷廷玉,山东人,字瑞琴,号稻村,生卒年不详,善书,其作品在国内拍卖公司多次拍卖,书法流畅优美。

2. 光绪时益阳名人刘世骥楷书文天祥《正气歌》大中堂。年代:清代(1645—1911);类别:水

^①《文天祥〈正气歌〉“印拓”现身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16日,第2版。

墨(黑白)立轴;款识钤印:“刘世骥印”。

除了艺术欣赏之外,民间对《正气歌》书法还承载特殊的信仰功能。如在文天祥埋葬地吉安,当地民间有挂《正气歌》以辟邪的信仰:

1281年5月,文天祥在狱中写了一首长诗叫《正气歌》,全诗共有60句。据说这首诗的书法真迹一直为文氏后裔所珍藏,据早几十年前见过此幅作品的人说:字迹是行草,大约与今天的报纸大小差不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吉安城田侯路为一排木板房店铺,其中“文记面馆”是富田文氏掌柜,文掌柜当时七十多岁。1948年4月间,这里突发大火,把这一溜的木构店铺烧得非常惨,烧了好几十栋。文掌柜眼见要烧近本面馆时,便从家中箱子里拿出珍藏的文天祥真迹《正气歌》悬挂在木板墙面上。文家世代相传,《正气歌》有镇煞避邪作用,果然,大火烧至“文记面馆”的邻居时,火就自然熄灭了,“文记面馆”没有丝毫损毁。……吉安人自古以来喜欢把《正气歌》挂在房屋中,避灾治邪。即便是现在,还有这个习惯。^①

除了以书法形式展现于纸质媒介,《正气歌》还以书法形式表现在多种日常器物上,直接介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它经常被题写或是雕刻在扇面、屏风、墨盒、砚台以及刻瓷工艺礼品等多种载体之上,此示4例如下:

1. 折扇:藤田啸谨书《正气歌》折扇。藤田啸为幕末学者,藤田东湖之父。藤田东湖著有《东湖先生正气歌》和《宋文天祥正气歌》,可见他自幼受其父熏陶,也非常喜爱文天祥的《正气歌》。

2. 屏风:是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一般陈设于室内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它往往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中式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民间收藏有一套共十二扇楷书《正气歌》屏风,结体方正,笔力遒劲,可以看出屏风主家之精神追求。

3. 铜墨盒:清光绪壬午年刻铜大师陈寅生微雕墨盒《正气歌》。规格:7.1×7.1×3.8厘米;底铭:“万丰”。在不足六厘米的刻面镌刻《正气歌》三百字长文,每个字体不足两毫米,观者需借助放大镜才能清楚地欣赏。其结构紧凑,笔画错落有致,而且每一笔的锋芒皆清晰可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从容大气,显示出镌刻者非凡的驾驭能力和深厚的书法功底。^②

4. 砚石:民国溥儒款端石瓦形《正气歌》诗文砚。砚端石,石质细腻,抚之若婴肌,包浆古厚,砚体厚重,长方覆瓦形,微微隆起,琢椭圆形砚堂,墨池状如新月,线条劲挺。砚背铭刻《正气歌》整篇,落款为“岁在乙酉九月庚辰,西山逸士溥儒敬录”,钤印“心畬”,带盒。溥儒(1896—1963)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工画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其所刻《正气歌》与其载体浑然一体,大大提升了器物的文化内涵,彰显了创作者和收藏者的文化品味。

综上所述,《正气歌》的见诸日常器物,进一步扩大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广度。

^①《民间爱挂〈正气歌〉》,中国吉安网,2015年11月30日,http://www.jgsdaily.com/2015/1130/1020.shtml.

^②小东篱:《赌盒》,百家号,2016年12月1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52473156329317&wfr=spider&for=pc.

四

以上所论均通过物的承载诉诸人的视觉而得以被感知,主要通过阅读来感知,适用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在民间,《正气歌》还借助戏剧、电影与歌曲等舞台形式,诉诸听觉进行传播,从而突破了普通民众的文字阅读障碍及其传播进程中的阶层限制,实现了妇孺皆知,进一步扩大了其传播广度和深度。而《正气歌》在广大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对其经典化进程的加速尤其具有决定意义。

(一)舞台传播。就戏曲传播而言,最早研究者当为萧源锦先生,他在《状元史话》中对历史上的状元形象作了系统梳理;在所有的古代状元中,文天祥是被戏曲改写最多的状元,这从其《古代小说、戏曲、弹词中的状元一览表》可以看出:“明传奇《厓山烈》、清杂剧《西台记》、清传奇《冬青树》、川剧传统剧目《三尽忠》、《柴市节》,都是歌颂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的,但各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①这些剧目都以历史事实为主,虚构成分不太多。由于作者抓住了文天祥的性格特征,突出了文天祥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除了上述剧目,关于文天祥的剧目还有不少,如筱波山人的《爱国魂》,虽是一本只有八出戏的短剧,却突出塑造了“铁肩担日月,热血洗乾坤”的文天祥的形象。^②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吴祖光均曾撰写《正气歌》,并在上海演出。京剧中也有多种《正气歌》演出本,如谭富英演出本、周信芳演出本、李崇善演出本等。艺术家对文天祥形象多有塑造,剧本也各有所胜。如周信芳演出本即名《文天祥》,全剧以文天祥与贾似道争辩和与战、元营议和而起;李崇善演出本则与之迥然不同。这些演出本都对文天祥及其《正气歌》的经典化与民间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如梅兰芳看了谭富英本《文天祥》后说:“富英的文天祥真正做到临危不惧,从容就义,这跟他高尚品德的素质有密切关系。酝于中,形于外,不是偶然的。我觉得京剧界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演员,值得骄傲。”在广东地方戏《西秦戏》中也有演出。^③

(二)除了戏剧改编,《正气歌》还被谱曲弹奏传唱。如谢琳《太古遗音·琴歌解题》《正气歌》云:“按《宋史》,丞相天祥被执至燕京,不屈。元世祖开谕百端,欲大用之。天祥忠义之心烈若冰霜,坚如金石,有死而已。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者三年。其平生节操已露于《和陶》之篇,既又作此歌以古忠臣自誓。后人播之弦歌,亦以见忠义凛然,万古犹一日也。”^④《太古遗音》为宋人田芝翁撰,可见《正气歌》在宋代已用弦乐传播。而现代乐坛上,音乐家谭小麟的《正气歌》谱曲演唱最为有名。谭小麟(1912—1948),作曲家、琵琶演奏家,原籍广东开平,生于上海;自幼酷爱中国传统音乐,并学习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谭小麟的作品大都具有很强的室乐性,努力摆脱欧洲传统音乐技法的束缚,而运用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作曲技术,并使之与清新的中国民族风格相给合,具有中国古典音乐的清秀隽永的气韵。以谭小麟为代表的音乐人的将《正气歌》谱曲演奏或歌唱,借助音乐方式扩大了《正气歌》的传播范围。

(三)神秘化的避难咒语念诵。这是被学界忽视的一个重要传播类型。但从前述吉安地区挂《正

① 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

② 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89页。

③ 杨雨行:《京剧与胜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281页。

④ 范煜梅编:《历代琴学资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

气歌》书法作品以驱邪之事,可以看出此诗民间传播和接受的神秘化倾向。而在一些地区,广大民众认为,不仅挂《正气歌》书画可用以驱邪,诵读《正气歌》也有此功效。下引一则叙述者为湖南师范大学薛开伍教授的故事,其中提供了益阳民间诵读《正气歌》以辟邪的很多信息。1991年,湖南师范大学要求年轻教师必须下乡从事社会实践,薛开伍和肖建斌老师一起分配到益阳县天成垅乡:

住在民居,虽然离乡政府不远,但也要走一大段荒无人烟的乡间小路。特别是晚上,黑灯瞎火,走在路上,还真是有些许寒意。熊法官告诉我,有一段诗,如果背下来,走夜路时念念,什么都不会害怕。熊法官写的这段诗,34句,每句五个字,一共170个字,虽然十分拗口,但闲着无聊,因此也没几天的时间,我就背下来了。说来也怪,按熊法官提供的方法背诵这首诗,还真有助威壮胆的作用,黑灯瞎火,走在乡间小路,再无丝毫胆怯。心理作用?从小到大,大人们教过多种壮胆方法,都没这首诗管用。回长沙市后,遇到一位80多岁的长者,才知这首诗就是文天祥写的《正气歌》。尽管熊法官手抄给我时,尽是错字别字,但从古至今,师徒口口相传,并不影响其功效。……相传文天祥为元军所擒,牢房里鬼哭狼嚎,妖魔作祟,不得安宁,于是文天祥作正气歌写于牢内墙壁上,很快宁静。在阴暗潮湿牢里三年,凭着一身正气而百病不侵,连小病都没有犯过。在民间和道家一些教派里,《正气歌》被视作避邪咒语,沿用至今。端坐大声朗诵正气歌也是儒家最经典的增精神、壮力量、消恐惧的辟邪功法。^①

从薛开伍教授的叙述可以看出,这种念诵《正气歌》以驱邪的习俗尽管不是非常流行,但绝不是个别现象。这从近年来流传的网络文章《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何被人用来辟邪?》中也可得到旁证:“朋友圈里看到一段求助——最近害怕天黑,天黑时想默念,可以默念什么呢?请告诉我,我需要勇气。毫无犹豫的,我给她回了一句——推荐文天祥《正气歌》,近二十年前同学教我的。我同学又是谁教的呢?是他饱读诗书的爷爷。”^②从此文可以看出,民间确实存在吟诵《正气歌》以驱邪的潜流一脉。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黑暗恐惧来自于心理暗示;而《正气歌》之所以能够驱除恐惧,应来自于其中积极的心理暗示。

五

以上详细展示了《正气歌》与其它诗歌明显不同的多维传播方式,其中也蕴藏了该诗的经典化进程。《正气歌》传播方式的不同,正说明了其所具有的囊括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雅俗共赏的广泛影响力。而细究《正气歌》被普遍接受、广泛传唱之因,可大致概括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正气歌》蕴含着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所说:“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具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① 薛开伍:《庐陵时间:文家世代相传,〈正气歌〉有镇煞避邪作用》,2018年3月26日, <http://www.kaiwu.net/h-nd-143.html?groupId=-1>.

② 凡人摸史:《文天祥的〈正气歌〉,为何被人用来辟邪?》,2017年10月7日, http://news.ifeng.com/a/20171008/52444384_0.shtml.

在这一精神指引下,每到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有一批批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高举爱国为民的旗帜,挺身而出,或抛家别亲,终身守边御敌;或征战沙场,为国捐躯;或面对强敌,英勇不屈;或迎难而上,乘胜追击;或排险除害,保护苍生。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田,就像一簇炽热燃烧的火焰,照亮中华儿女前行的道路,使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和劫波,始终充满生机活力。”^①而文天祥是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毁家纾难,积极勤王;其《正气歌》体现了他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每当遇到外侮,《正气歌》就会成为鼓舞全民族斗志的号角:

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②

正因为这种爱国精神具有永恒的魅力,才能被整个社会一代代传播和接受。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正气歌》满足了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且具有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光辉,其精神不断被后代实践者,发展着。《正气歌》是文天祥用生命谱写的正气之歌,是生命最终凝结成的血泪之歌,不仅是他理想美、人格美的体现,而且是其爱国思想的集中升华。其精神和内涵就像是中华民族魂的一支火炬,永远鼓舞着我国各族人民主持正义,团结奋进,且永不过时。因此《正气歌》也就会永远传唱。

其二,人文相扶,和谐共生,文以人名,人以文传。人文相扶是指作家与作品互相支撑,共同塑造作家声誉以及作品文学史地位。文天祥已经与《正气歌》不可分割,《正气歌》就是文天祥的亮丽名片。古人评论一个人的价值,道德文章就是重要指标,文天祥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完美统一。一方面,传统文化强调以德为先,文天祥的壮烈之举与后人的崇高评价提升了该诗歌的声誉。如果不是文天祥的超越人格和卓绝事迹,换成一个普通作者,这首诗会有重要影响,但很可能不如今天这样广泛。元代脱脱主编的《宋史》就给予文天祥高度评价:

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④

① 杨超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5日,第8版。

②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④ 脱脱等:《宋史》卷四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40页。

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评价文天祥的基调。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危急关头,《正气歌》总会唤起民众心中的共同而深刻的心理情感,也成为文天祥形象塑造的情节高潮。尤其在戏剧作品中,《正气歌》总是在情节最为高潮的地方朗诵,“文天祥”在《正气歌》的朗诵中实现了自己的人格升华和自我实现。在此意义上,《正气歌》强化了文天祥的光辉形象。这种传播强化了文天祥的伟大形象,而文天祥形象的伟大反过来促进了《正气歌》的传播,名人与名文互相激荡,强化着《正气歌》的影响和文天祥的形象塑造,循环互动,促进了二者的传播和接受。

其三,主流爱国思想和民间实用观念在雅俗视野中的和谐共生,民间传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气歌》体现的爱国思想、文人气节,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尤其在文人志士知识分子阶层中更是具有持久而深入的影响,通过阅读书写而被感知,进而进行再创造再传播。作为文人雅趣,《正气歌》被一代代书法家书写,阐释。《正气歌》体现的精神在新时代下也有其积极意义,永不过时。通过舞台艺术,对文天祥进行二次塑造,观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来感知文天祥的不凡人生,打破了文字障碍,实现了雅俗共赏。而通过挂画驱邪、念诵驱邪等民间方式,使得《正气歌》具有了神秘信仰的穿透力。驱灾辟邪,祈求平安是民众的普遍而恒久心理,实用性目的,功利性使用,使《正气歌》传播获得了坚实的民间平台,在很长的时间内会代代相传。这样,其传播范围跨越了阶层限制,在雅俗之间,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获得了广阔的认同和接受空间。

综上所述,《正气歌》在文学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种特殊性使得其传播具有自己的特色,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也被不断的二次创造和传播,这也是其生命力根本之所在。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Canoniz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FAN Chun-y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by Wen Tianxiang is a famous masterpiece of patriotic poetry, which has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its canonization, it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mensional dissemination. The multi-dimensional dissemination refers to the various ways of dissemination such as texts, stele rubbings, calligraphy works, handicraft works, drama, music and folk chanting. Meanwhile, its dissemination also covers all social strata and two cultural levels: the elegant and the vulgar.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high acceptability of this song in Chinese society. First, the patriotism it reflects is of lasting charm and should be accepted and practiced by people in different times. Second, people and literatur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ous authors and famous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but also promotes their reputation. Third, its content transcends elegance and vulgarity, and embodies both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and folk practical functi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eeking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nd developed in another sense.

Key words: Wen Tianxiang; *Song of Righteousness*; multidimensional dissemination; canonization; reception by the general public